

刘润为 著

潮流之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源流之外

126
4059

刘润为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流之外 / 刘润为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-7-212-03000-1

I. 潮… II. 刘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205 号

潮 流 之 外

刘润为 著

出版发行: 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发 行 部: 0551-3533258 3533268 3533292(传真) 邮编: 230071

组 编: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 话: 0553-3883578 388357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 印张: 6.375 字数: 143 千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12-03000-1

定 价: 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为劳动大众说话(代序)

杂文是劳动大众的事业。为劳动大众说话,是杂文家的庄严职责。离开了这个立场,杂文家就会变得轻浮,变得委琐,变得一钱不值。这里所说的为劳动大众说话,不是像上帝一样对众生施以悲悯,也不是像精英一样为愚人指点迷津,而是要有自知之明,真正懂得自己就是劳动大众的一员,要与劳动大众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。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说:“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”。面包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、是精英,而是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他认为理所当然又为人类所必需的工作。如果杂文家也有这样朴素而高贵的意识,那么他的创作就会成为劳动大众求生存、求发展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,就会在享受劳动大众提供的衣食住行的同时,也为他们提供劳作和战斗间隙的休养,提供指向欺侮他们的群小们的匕首和投枪。只有沿着这样一条普通人都不回避的道路,杂文家才能走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,杂文创作才能获得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。

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。提高杂文的文化品位,是杂文创作的本质要求。没有文化品位,杂文就成了评论,成了

流行词语的堆砌，成了某种观念的传声筒。所谓文化品位，不是说一定要引用多少名言、多少典故，而是一种由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陶冶出来的文化气质的自然流露。具体地说，就是表现出一种视通古今、总揽天下的眼界，一种烛幽显隐、析肌剔骨的笔锋，一种精骛八极、心游万仞的想象，一种天机独会、妙处自得的理趣，一种随手拈来、恰到好处的材料使用，一种不着斧凿、浑然天成的谋篇布局。只有这样的杂文，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、心灵的净化、情感的慰藉、审美的愉悦。在这方面，伟大的鲁迅至今仍然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峰。我们必须学习鲁迅，但无须模仿鲁迅。我们应当自觉把握时代的脉动，根据自身的文化个性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杂文是人格的光辉。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，是杂文创作的重要原则。所谓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，就是要与批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，表现出良好的教养、高尚的情怀、雍容的气度，表现出挥洒自如、高蹈轻扬的精神优势。如果以一种非常狭小的器量对待批评对象，就会使杂文变成私愤的宣泄，变成辱骂和恐吓，甚至变成刻薄阴狠的深文周纳。某“著名杂文家”以杂文致人自杀，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这样的杂文，因其偏执和鄙陋，非但不能达到讽刺、批评对象的目的，反而招致读者对批评的厌恶。批评需要理性，不需要个人的私情。个人应当代表人类的理性，代表人类的尊严、正义和光明。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：“他可能有过多敌人，但未必有一个私敌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第778页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

版)这——就是人格优越性的根本所在。

总之,杂文创作既是为了改造社会,也是为了改造自我;既是大众文化建设的过程,也是个人精神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既要热烈地主张所是、热烈地攻击所非,又要无情面地解剖自己;既要像春蚕吐丝一样为社会贡献美文,又要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精华。用高标准要求自己,用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自己,这样长期坚持下去,我们的杂文创作就一定会不断进步。

2003年10月6日

目 录

为劳动大众说话(代序)/001

辛弃疾父子的“代沟”/001

捧捧明星与救救教师 /003

也谈“费厄泼赖”/006

“嫂溺,援之以手”之类 /009

身份表现学发轫 /012

“老板意识”正义 /015

官本位一种 /018

老莱子和当代老莱子 /022

清芬的邂逅 /025

戏说“贵族”/028

从街上流行“洋头”说起 /031

向雷锋学习什么? /034

暗送秋波 /040

中国古代的“傍大”/043

“国事管他娘”及其遗传与变异 /046

人生岂只是“过瘾”? /049

老前辈不可“超脱”/052

“孔雀”开屏 /055

焦大的出路 /059

谁家的人权? /062

马前卒的悲剧 /065

《牡丹亭》与小青 /068

官贼之辨 /071

上当受骗之外 /074

初识王利滨 /077

“曲学”三境界 /081

欢迎萨瑟 /084

款爷拍马入门 /087

官人媚上三部曲 /090

为薛蟠《女儿词》作序 /093

从苟才儿媳说开去 /097

影响的焦虑(文学篇)/100

影响的焦虑(政治篇)/103

从亨廷顿们的祖宗看他的“文明的冲突”/106

“写给工人兄弟”/109

赤子公心

——祝贺《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》出版 /112

官家被盗以后 /116

“梦诗”的尴尬 /119

对梁晓声、张承志“反省”的反省 /123

说盗 /127

喜儿出走怎样? /131

天爵与人爵 /134

对张光年先生的不信任情绪 /138

一个百姓眼里的朱镕基 /142

最后审判 /146

暗杀的阴影

——访问南斯拉夫手记 /149

丽江之夜 /154

小康·大康 /157

拜佛歧路灯 /160

也谈秦桧的人权问题 /163

知耻近乎勇 /167

画起当代之衰/170

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》片头语 /172

大师的风度

——杨向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 /173

追求金钱的哲学 /178

石家庄的慷慨悲歌 /181

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 /184

附：

瓜瓞绵绵转世心

——读《瓜田小品》/187

青云高处秋鹤唳

——读高扬的杂文 /191

跋 /194

辛弃疾父子的“代沟”

关于辛弃疾,我不知道今人到底有多少种评价,但说他是一个倒霉的人,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。他不顾南宋王朝危厄迹象已彰的事实,坚持抵御外侮、收复中原,却偏偏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和使用,60多岁高龄之际,镇守京口,又受到权臣韩侂胄的排挤,于是愤然辞职。不料此事却遭到他儿子的反对。理由呢,实在简单得很——“田产未置”,也就是还没有富起来。对此,辛弃疾大为恼火,特地填了一首《最高楼》,予以痛骂:“吾衰矣,须富贵何时?富贵是危机……千年田换八百主,一人口插几张匙?便休休,更说甚,是和非。”

读其文想见其为人。从那紧连急接的句式、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尖锐辛辣的措辞,我们依然可以想见他当时不可遏止的怒态。至于他儿子的态度如何,是接受了训斥还是继续对着干,则不得而知,但事情毕竟是按辛弃疾的意见办了。此事用不着细做考证,单从他晚年的词章就可以窥见消息。“竹树前溪风月,鸡酒东家父老,一笑偶相逢”;“被野老、相挟入东园,枇杷熟”;“野老争言雨水匀,眉头不似去年颦”……那种与农民交往的亲密,那种对于农民苦乐的细腻体察,绝不可能出自良田广袤、朱门森严者流的手笔。

如果用新潮理论来分析这场父子之争,毫无疑问地是由“代沟”所致:辛弃疾压抑自我,无视个人欲望的存在;其子则

大抵属于反传统、放纵欲望的新派人物。这种定性正确与否，我不敢妄断，但以此判断“新”、“旧”则是不敢苟同的。辛弃疾的观念“陈旧”当是毋庸置疑的。汉代就有霍去病，皇帝老儿主动为其置办宅第他都不要，还说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但是辛氏之子的观念也未必新，因为在他之前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所在多有。东汉末的著名“国士”许汜就是一个对“求田问舍”相当积极的人物。有一次，他到陈元龙那里去，因为观念的对立，陈很长时间不理他。更不给面子的是，休息时，陈自己高卧大床，而让许躺在下床。当他满怀委屈地向刘备述及此事时，殊不料刘备竟当面训斥说：陈元龙待你还算是客气的呢，如果换了我，就是我居“百尺楼之上”，而让你睡在地下。看来，这观念的分歧也够可怕的。这位因“求田问舍”而一再碰灰的许汜先生，比辛弃疾的儿子要早上近千年哩。

依我看来，这场父子之争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原因就是父不得其子、子不得其父。“求田问舍，怕应羞见，刘郎才气。”辛弃疾的这些作品，其子大概也当读过，毋庸说做其父的接班人，就是对他的胸襟怀抱能有些许理解，也不会惹得其父如此大动肝火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辛弃疾一心想的是让子女们先富起来，其父子关系也必定是融融如也。人说“理解万岁”，难矣！

至于哪种观念为是，哪种观念为非，笔者则不胜困惑之至，一应顺乎接受美学的逻辑，让这个未定的文本到读者的接受中去完成。

1992年10月3日

捧捧明星与救救教师

小时候读过契诃夫的一篇小说,说的仿佛是:在一座大桥竣工之时,该桥的总工程师偕其情妇去参加典礼。因为其情妇是名噪当地的歌星或舞星,所以成了人们的兴奋中心,而典礼仪式的真正主角却被冷落。人们甚至不知道总工程师的大名,而只知道该桥的总工程师是××明星的情夫,真是“夫”以“妇”荣。

工程师怎么就不如一个明星?这对于当时信奉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我来说,是不可理喻的。物换星移,时光如梭,小说的题目、人物的名字,通忘却了,甚至连情节的骨架也模糊得很,那疑团自然也被埋到了意识的深处……

近来有经济学家林子力的“新价值论”轰动一时:“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重大缺陷和迷误”,就是“没有把不同劳动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加入劳动抽象过程”,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计算价值的尺度。读到这个理论,我的眼前不禁一亮,沉埋了近30年的那个疑团也一下子跳了出来。总工程师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比其情妇大得多,但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却比其情妇弱得多,人们冷热分明,自是理所当然。蒙了一层时间灰尘的茅塞一旦顿开,内心的喜悦自然不可名状。

然而,这喜悦不久又被一系列的事实所轰毁。

去年12月,数家报纸纷纷报道:中国著名影星巩俐,15日

在上海出席成都盛大房屋发展公司赠房仪式，接受雅风园别墅一栋。雅风园建筑面积 168 平米，占地 208 平米，游泳池面积 30 平米，花园面积 88 平米；四房二厅三卫一厨房一车库，三阳台。上海《文学报》还在第一版配发“仪式”照片，但见巩俐小姐满面春风，那位赠房先生也是浑身的幸福。

更有今年 1 月 1 日《中国文化报》报道：“一家广告公司的‘大款’对毛阿敏说：你的歌唱得就是好，我们公司将来约你演出给你中国最高价。在场的人打诨说，5 万还是 8 万？他说一定给到每场 10 万元以上。外国人捧自己的歌星肯出大血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捧捧当今中国最红的歌星，让她也拿一个天文数字，我们作为中国人也风光一下。”此公此言，大有问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烈。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志气呢？

另一面的事实是，去年 12 月 23 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在第 1 版以《救救教师！救救孩子！》为题报道：“四川省仪陇县的 7000 多名教师，今年到 11 月底为止，已经有 7 个月未领工资了，他们全都靠家人和亲朋接济度日。”记得在发表这则消息当天的编前会上，本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同志满怀期待地说：“请诸位注意，如有赞助该地区教师的举动，本报立即在第 1 版显著位置给予报道。”遗憾的是，迄今为止，未见哪位款儿、腕儿、穴儿、跳蚤、哥儿、姐儿拔出一毛，倒是一名老教师从自己菲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了 100 元！

世态炎凉竟至于此，便显示双方“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”么？就说这“需要”吧，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番分析呢？其间难道没有深层与浅层、眼前与长远、粗鄙与高雅、正面与负面的区分么？一做区分，其间又怎样比价、换算或折扣呢？着实是越想越糊涂了。

既然“新价值论”不能满足我的“需要”，便索性倒退回去，

求教于传统。老子说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孰能有余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七十七章）然而，老子的话也让我困惑：是行天道还是行人道抑或人道掺些天道抑或天道掺些人道？这“损”和“补”，损多少补多少；这“损”和“奉”，损多少奉多少，才算是合适？想来想去，还是“凭着感觉走”这话实在。我的感觉是：明星尽管去捧，陪妞尽管去泡，只要在捧得泡得兴味阑珊的时候，拔一毛略做“救救教师，救救孩子”之类的事儿，我就送他一顶“有道者”的桂冠。

“桂冠”可谓物美，“一毛”可谓价廉，各路神仙岂有意乎？

1993年1月7日

也谈“费厄泼赖”

鲁迅先生的“费厄泼赖应当缓行”，以前大抵公认为不刊之论的，但近年竟有人跳出来说，鲁迅的说法已经过时，费厄泼赖应当实行！

“说大人则藐之”，这种勇气固然可嘉，然也须持之有故。否则，便难免落入轻狂一流。

应当说，在主张普遍实行费厄泼赖的人当中，确有主观上的真诚者。两千多年前的东郭先生，虽未受过西方现代观念的熏陶，却无疑是极讲博爱的，甚至于博爱及狼。若不是赵简子及时相救，此公大约必定成为一名光荣的殉道者。东郭先生虽然行为迂阔，却是表里一致的，因而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。另一类则不然，用当今的熟语来说，未免涉嫌假冒伪劣之类。圣子耶稣曾经庄严地传达过上帝耶和华的指示：“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”殊不知在此以远，上帝已通过摩西传达过另一条诫命：“凡恨上帝者，由父及子，罪究三代”，可见对反对他的人并不“费厄泼赖”。岂但对反对他的人不“费厄泼赖”，就是因一念之差而忤逆了他的旨意的人，也同样绝不“费厄泼赖”的。亚当、夏娃不是因为偷吃禁果，在智力上逼近了他，而被罚作终生受苦并祸及子子孙孙么？为什么不考虑蛇的诱惑的因素呢？为什么一点儿也不给改正错误的机会呢？在倡导“忠恕”的人当中，理学大师朱熹算得上“资深”的一位，

然而也是一位构陷他人的里手。为了打击与其学术见解不同的唐仲友，竟然对与唐正常交往的弱女子挺杖有加、锻炼逼供，终究落得个“硬勘案大儒争闲气，甘受刑侠女留芳名”的笑柄。至于在朱老夫子的潜意识里边是否有弗洛伊德的什么“情结”之类，只能留待“新潮”理论家们去挖掘，我只知道此公扯的什么“天理良心”，都是教训别人的，离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远得很。与此不同的是，梁惠王好色就如实承认“寡人好色”；邓綰借王安石变法之机钻营却不掩饰：“笑骂从汝，好官须我为之”；路易十五对自己的荒淫无道也是供认不讳：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。”这三位的自白虽有恬不知耻之嫌，却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，因而要比“二重性格”者流可爱得多。

今日之日不同于往日之日，今人之心亦不同于古人之心。然而，费厄泼赖就当真可以普遍实行了么？正视现实的人都会承认，这个世界并不太平。“丛林”法则依旧时髦，不平之事比比皆是；魔鬼、狐鼠、蠹虫招摇过市，流血、压迫、剥夺、欺诈随处可见……在这样一个世界上，扯起“费厄泼赖”的旗帜，不能不说是一种“大跃进”式的冒进情绪。对于真诚的迂阔者来说，则是不自觉地给邪恶势力的炮弹涂抹糖衣；对于邪恶者来说，则是遮掩真实面目的画皮。君不见西方的一些头面人物，一面高喊“博爱”，一面无情地铲除政敌，甚至连身患绝症的八旬老翁都不放过；一面大讲“人权”，一面大肆侵犯别国主权，甚至滥杀无辜。这些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的事实，难道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吗？

有人或许要问：那么你是反对费厄泼赖的喽？不是。费厄泼赖当然是好东西，费厄泼赖当然要实行，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费厄泼赖。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，我们现在才主张不能对什么人都实行费厄泼赖。对于祸害人